

本期话题：访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

## 访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

□ 顾晓光 /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12.08.001

在葛剑雄先生2007年三月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前,我知道他是一位知名学者。我有个朋友听说我要采访他,说一定要让我向他问好,因为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我看过葛先生的著作,后来现场听过他的讲座,也从中受益匪浅。在他诸多的社会角色中,最吸引我的是历史地理学教授。

我有幸与他见过几面,而且与他同行过南非和埃及。在非洲12天的时间,他给我的印象是有着很强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知识,而且会不厌其烦地回答我这个后学的种种问题。旅行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加深对一个人的了解,他有着我喜欢的人格魅力:开阔的思维、包容的心态和老派文人的情怀。

他是文革后的第一代研究生,重新求学的时候已经33岁,1981年任职于复旦大学,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是某种典型的八十年代学人,用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的话说,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获得一次真正的觉醒;同时又在历史提供的特殊机遇中,与直接继承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辈学者相遇,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联结,并进而把自我的新觉醒转化为新的学术。

作为一个个性十足的人,他的学者身份和图书馆馆长角色都给他引来一些争议。他做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年后,我曾经问过熟悉内情的同行葛先生做馆长做得如何,得到的答复是他管的有点多了。

我对这个回答一点也不觉得惊讶,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葛先生。他既不会去做名义或者名誉馆长,也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管理者。他有着自己的管理哲学,向上要钱,向下服务。对服务的对象有人本的关怀,对协助服务的同事和领导又有点眼里不容沙子。这在此次访谈中也得到了体现。

今年,由于保安的失职,小偷在图书馆偷走了一位学生的iPhone。葛先生从放弃的津贴中拿出4000多元,赔给了这位学生。他体谅弱势群体的保安,但又要维护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和读者的权益,这是很多人所不知的。

他认为他们进行的还是最基础的服务,图书馆应该有的一些职能还没有发挥出来。他希望人们不要过度地运用新技术,更是反对“唯技术论”,提倡人们将自己空一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节奏不要那么快。但是,他又不排斥技术的应用,而且也是实践派,从做了十年的数字化地图,到现在作为图书馆馆长进行数字化的诸多服务。

同时,他还写博客和微博。他的微博有31万的关注者,主要用来解答专业知识和用户对图书馆服务的问题。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回答一些回复过多次以及非常琐碎的问题,充当了网络信息咨询员和图书馆服务投诉站的角色,这在图书馆馆长里面是少有的。

他反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民粹倾向,从中我能感受到,虽然“卑贱者最聪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们更应该吸取之前的教训,用“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更加科学化的服务态度和更加务实的服务方式,合理地进行文化发展的投入。

这位62岁才成为图书馆员的学者,与他所尊敬的导师谭其骧先生有着除了专业之外同样的经历。谭先生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泰斗曾经也是一名图书馆员,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编制馆藏方志目录,兼为袁同礼馆长代笔作些文字,如有些展览介绍。师徒二人不仅在相同的专业上造诣深厚,而且在图书馆员这个职业上也有着一种生命的遇合。

葛先生当馆长后,忙于很多行政事务。他说没有时间好好看书,全是忙杂七杂八的事情。一定要在这一届任期内卸任,不再续聘,给后来人以成长的空间。

顾晓光：您是从2007年3月份起，开始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从读者到服务读者的角色转换，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者说有什么之前没有想到的？

葛剑雄：这些年来，我是用图书馆比较少的，但是也听说了图书馆种种的弊病。我的学生、我周围的朋友也都跟我讲过图书馆服务方面的问题，比如学生在毕业前与图书馆弄得不愉快、平时的服务不好等。这些意见不光是对我们图书馆，对社会上的图书馆也是一样。我的学生去国图，借一本书要很久，而且有些项目要收费。

所以，当时想既然做图书馆馆长，我就尽量去改变一下目前的状况。当初校方找我谈话的时候，说我用什么方式工作，校方不干涉。但是我要负全责，而且不能辞退员工。有历史问题的，慢慢消化掉。

但是，真正工作下来以后，应该说有些方面比我预料的还要麻烦，比如说有心理疾病的，有在门口打起来的，还有大家抱怨待遇低。在馆藏方面，虽然我们说藏书450万，其实这包括了复本，比如《英语900句》，可能有上百册。很多复本是没有意义的，无效的。

应该说经过五年多，明白了图书馆本身应该做什么，而且现在基本上能够按照我的意图去做了。

顾晓光：除去历史原因，像40岁以下的馆员角色和您想象的图书馆员的身份吻合吗？

葛剑雄：到现在为止，我对学校校长、党委书记以及学生都说，我们进行的都是低端服务，正常的图书馆职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顾晓光：还没有办法？

葛剑雄：还没有办法发挥，我们进行的是低端服务，我们这两年逐步做到了。

顾晓光：以前做的不好？

葛剑雄：对啊。所以，我提的口号是“读者至上，服务无疆”。但是，一方面，作为211大学，复旦大学人均图书馆的建筑面积低于教育部标准，我们硬件方面还不够；在员工方面，这几年才有硕士、博士入馆工作。虽然以前也有，但这几年才大规模地引进。要做到学科咨询、学科引领，那差距还比较大。

这几年，数字化的势头很猛，但是我们连续三年没有招聘到数字化方面的人才了，因为图书馆的待遇是个问题。即使在复旦大学，他们可以去信息中心，待遇也比我们高。别的部门有些收费的项目，而我把很多收费的项目都取消掉了，收支两条线。我们的待遇怎么办，怎么既吸引人才，又要做好图书馆的服务，这是问题了。

江湾图书馆外景



顾晓光：这可能是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的问题。

葛剑雄：对于复旦大学来说，还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在很多重点高校里都有图情系，复旦大学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骨干都要从外面来，自己的毕业生是不懂图情的。同时，很难使我们的骨干双肩挑，既有图书馆，又有院系，可以进行科研任务、解决职称等问题。这也是我们员工的一个困难。

所以说，我先做的是最紧迫的问题，把低端服务做好。至于其他服务，有人建议做讲座服务，我说暂时不搞，复旦大学不缺讲座，我们连诺贝尔奖得主都可以请来，用不到图书馆来做这种事情，而且我们的主校区连讲座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的主要精力不在此。再比如说，电子课程的问题，我们要先和教务处、科研处等部门协调好，所以，先保证最基本的服务。

顾晓光：图书馆的服务有层级服务，比如满足一般需求的基础服务，满足教学、科研或者企业的高端服务。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高端服务或者增值服务进行收费？

葛剑雄：绝不，除非有物质成本的，比如说复印。我测算了一下，标准A4纸的成本是九分多钱，我们不考虑机器折旧，就只收取一毛钱。有学生说校园里还有更低的复印服务，我专门去调查，结果发现用纸不一样。这些纸质量低，而且可能损害机器，所以我们不能用。我坚持只收成本费用。

即使是高端一点的服务，比如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时，有人要查阅相关史料，我们也统统免费服务。包括古籍、善本的拍照，我只要读者签一个承诺书，保证不用于商业目的就可以了。

顾晓光：如果商业机构用户需要你们提供服务呢？

葛剑雄：那需要收费。如果有机构需要出书，那就按照行规，一页收多少钱。你是商业机构，我为什么要免费给你服务，但是我们也会把这些收入统统上交学校的。

顾晓光：您担任馆长后，取消了针对教工和学生的

一切收费，包括以限制借阅来替代延期罚款这个普遍采取的做法。从目前的结果看，这项措施效果如何？

葛剑雄：是的，而且把读者以前超期的也免掉了，不要再用这些办法了。目前总的来看，效果是好的。我们先通过提醒，逾期后还不归还，就停止借阅权。我们把借书量扩大到30本了，准备还要扩大，以后再看看是不是研究生可以做到无限量的借阅，因为现在出借的书是很小一部分。但是超期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不光国内是这样，国外也一样，不过他们通过一些措施来尽量避免。最近发生一例，有位读者超期，我们催了他好几遍，他不还。我们只好把最后的一本保存本借给需要用的一位读者。还有一个问题，旧平装书价格不菲，有些读者借后不还，主动按照10倍的价格赔付，但这本书的市场价格早涨到20倍了。针对这个现象，我们会有两个采编部的馆员核查、定价，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如果读者嫌我们定价过高，他可以拍卖后送来，我们每本书收取10元加工费就可以了。有人说，你要相信学生的诚信，我说这是有条件的，我不能任由国有资产流失。相信学生，不是相信每一个人。这要与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区别开来。

我们也不想搞得太繁琐，比如有人建议用现在的电子座位控制系统来解决占座问题，我不倾向于这个。占座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我们满足不了同学的需要，虽然会有一些不自觉的学生。我们可以向学校反映，教务处加以配合，增加开放空调的教室，这样矛盾就减少了。目前是如果教室坐满70-80%的学生，马上开第二个。不要动太多管人的念头。

顾晓光：中山大学图书馆也通过其他方式来替代了罚款政策。但目前这种非罚款的处罚并没有在高校中广泛推广开来。

葛剑雄：各个学校情况不同，这也需要一个过程。举个例子，我刚当馆长不久，要求图书馆里的卫生间都要有卫生纸、洗手液和烘手机。

顾晓光：我在您的一次讲座中听您讲过埃塞俄比亚的一家高校图书馆都有卫生纸。

葛剑雄：对啊。去年花了9万元，我认为还是值得的，现在复旦大学其他的楼也开始放卫生纸了。文明就



医科馆外景

是这样一步步来的，我们不要大楼金碧辉煌，里面却连这样的服务都没有。

**顾晓光：**目前很多高校图书馆纸本资源的借阅呈下降趋势。您刚才提到鼓励读者借更多的书，现在的纸本资源借阅是上升还是下降了？

**葛剑雄：**有所上升。我们现在已经开放30本外借，另外特殊情况特事特办，还可以增加。而且，研究生和教师可以申请IP地址，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图书馆。我们也准备面向本科生，但是数据中心不配合，因为数量大，到现在还没有弄好。我还在催，因为我答应每个本科生也都应该有，这样我们的资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且可以减轻图书馆的压力。读者在宿舍、家里、外地都可以使用。

今年开始无缝对接，本科生新生拿到一卡通就可以借书，以前是先拿临时卡，只能看不能借，因为教务处需要审批所有学生合格后才能开放借阅。我问他们不合格学生一年有几个，为什么就因为几个人而不做呢！本科生如果接着读研究生也无缝对接，不用等研究生报到后再开通。

**顾晓光：**您在一次讲座中也谈到“用户永远是正确的”这个有些争议的观点。如果用户永远是正确和服务双方沟通理解偏差的情况下，那么如何保障图书馆员自身的权益？

**葛剑雄：**法律还讲无罪推定，学生离校如果有欠书

的话，学生说了算，哪怕电脑显示有书还没有还，学生说还了，我们准备了一张特殊情况登记表，学生签字后，他就可以走。我跟学生讲过，你们都是未来的精英，我不相信为了一本书，你们留下这样一个签名。我在BBS上讲，你们放心，由此造成的图书损失，由我个人赔，我决不向你们要书。我们推行四年了，基本上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会说我再去找找，后来书就找到了。还有人主动要求推迟办理离校手续，再找找看。现在网上就可以办理离校手续，如果没有欠书，都可以不用来图书馆了。最近三年，没有发生过离校不

愉快的事情。

最近还有一件事情，也有同事反对，但我做了。有学生的iPhone在阅览室被偷了，后来录像显示，保安正在和一位老师说话，小偷没有刷卡就进去了。我说这样的话，这是我们图书馆失责造成的读者损失，应该赔。但如果保安进行4000多元的赔偿，压力太大，弄得人家下岗了也不好，我说我们来赔，费用我来想办法，不能用公款。后来，这位学生说出乎意料。同时，这个小偷又跑到文科馆，也偷了一个手机，我们通过录像看，是小偷向一位大二的学生借了卡进去的，这样的话，图书馆是没有责任的。我们教育这位学生，并停止他进入图书馆一段时间。

现在这位保安认真得不得了。我讲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就需要保安赔了。我们都要分责任的。

**顾晓光：**我在微博上看到很多人称赞您对于此事的处理方式。对于高校图书馆向公共开放服务，您的一个观点是“坚决反对把大学图书馆全盘变成公共图书馆。比如从硬件上，大学图书馆就不具备向公众开放的条件”。但同时，在社区图书馆不发达的今天，复旦大学图书馆又在很多方面为公众提供了很多服务，请再谈谈高校图书馆的公共服务并介绍一下复旦大学图书馆在公众服务的举措。

**葛剑雄：**我始终坚持高校图书馆绝对不能全部开放，而且也根本没有必要。第一，我们的高校图书馆在建筑设计上没有考虑到向公众开放的容量，大多并不具

有这个条件；第二，解决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在政府，比如上海地区，通过上海图书馆市区联动、网络化管理，普及到每个街道。图书馆的建设应该像公园一样，多大范围内必须有一个图书馆，要社区化。对于特殊的需求，比如上海图书馆没有的书，街道没有的书，我们可以提供服务。

国际上的高校图书馆也没有自由到这个程度，大多数是只允许非本校读者进入，坐到里面看书，不能够借走书的。个别可以借走的，会有一些问题，包括社会的诚信程度、社会治安等。我们不能做鸵鸟政策，这是不现实的，没有必要这么做。

现在我们面对公共服务存在一种民粹化的倾向。我是一开始就反对博物馆无条件的免费开放，我在报上写过。比如上海博物馆原来门票只有20元，你说上海有多少人20元出不起？我们对公民的教育是：我要提供你服务，你也要付出，这才是正常的。对于一些人，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定期发免费券，学有些国家每周或者每月一天免费开放，对老人、儿童、残疾人免费。完全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解决，没有必要普遍化。现在政府每年投入二三十个亿，效果怎么样呢？中国老百姓不上博物馆，不是上不起，而是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意识。上海博物馆一度外国人比中国人还多。这样一来外国人也不能收费了，何必这么大方呢？我们到联合国还要买票，有多少地方不买票啊？

有人说，这是纳税人的钱。我说中南海也是纳税人的钱，你能随便走吗？国防部也是纳税人的钱，你能去吗？纳税人把钱交给政府，已经授权政府分别使用了。政府给我们这部分钱就是高校来用的。我反对盲目的为公众服务，如果公众有特别的需求，我们会提供，但是我不希望为了看两本书，看看《人民日报》也跑到我们图书馆来。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周围没有社区图书馆，我们可以通过与社区共建的方式，有组织地向他们开放，这是可以的。

还有这里面牵扯到法律问题，很多人不懂。比如说我们和杨浦区共建，他们要求我们向他们开放数据库，因为有合同的限制，我不同意。我后来采取什么变通的办法呢，请他们提供一个30人的名单，我们将这些人聘为一年期的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包括校友，有些人在微博上说上海交大为校友开放数据库，我说如果这样做，那是非法的，因为校友是不断增加的，费用如何满足？我对他们说如果有特殊需要，我们特殊办法解决，可以通过原来所在院系的学生帮助你，或者你来图书馆看。

在中国要防止公共服务中民粹化的倾向。我们领导不要不负责任地动不动就采取这样的措施，在一线没有准备，也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不要轻地表态。

24小时图书馆，其他地方也是没有的。人家一般相当于自习室的地方才是24小时开放的。还有，我在美国时发现，院系可以给教师和学生一把钥匙，你可以到资料室用，这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微博上有人告诉我，哈佛大学有100多个馆，真正做到24小时开放的只有一个馆。

顾晓光：说到24小时图书馆，我想到我国国家图书馆和省市级的很多大型图书馆都已经365天开馆了。前一阵儿，微博上有个深圳市民去深圳图书馆，结果深圳图书馆由于检修而没有开放，他在微博上表现出不满，而图书馆界的很多同仁就此发表了很多评论。我并不认同现在的图书馆需要365天开馆，我的理由是，作为非特殊行业的员工，也理应享受一个公民享有节假日的权利。我们可以通过周六、日开放来满足上班族的需求，而在一年11天的公共节假日，图书馆没有必要开放。您怎么看公共图书馆的365天开馆？

葛剑雄：我任馆长后做了一件事情，在法定节假日期间闭馆。以前是开放的，我为了这件事情，讨论了两年。我给学校打报告，征求各方意见，开始研究生会坚决反对，最后我说服了他们。我的理由是：第一，国家设立假日，就是希望你们休息、娱乐或者继承传统文化，比如清明，否则设立假日干什么！另外，好的学校就是理应该休息就休息，该学习就学习，该工作就工作。现在又不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做到常态化。第二，就是你刚才讲的，我们的馆员有宪法保障的休息权，特别是一种特殊的传统节日，我们员工为什么不能在清明节扫墓？第三，通过考察，收集数据，发现效率很差，来的读者很少，浪费很严重。比如春节三天，图书馆才来了十几个人，而我们参与服务的馆员都比读者多。第四，我们有很多替代的办法，24小时提供网络服务，还有热线服务电话。另外，在放假前，我们征求读者意见，如果有特殊需要，我们特事特办，单独提供服务。

我是反对365天开馆的。公共图书馆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也没有必要普遍提供这样的服务，应该通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服务民众，比如告诉读者春节开1/10的馆，假日我要关闭哪些服务。我们可以有应急的措施来满足读者，像夜间药店服务，你按门铃后，我提供服务。虽然公共图书馆在节假日有向大众提供娱乐的服务，但要从

实际出发,不必强调365天开馆。我们的目的是不要作秀,要讲究实效。

另外,我反对不顾成本大量使用机器。比如说以前有公司要赠送我们两台24小时自助借还机,我打听了一下,40万元,里面只能装几百本书,如果使用期十年,加上维修费,即使赠送,成本也太高。而且40万如果用在员工身上,效率比它高,还可以减少员工下岗情况,要考虑我国的现实。



文科馆外景

顾晓光: 公众如果将葛剑雄和图书馆联系在一起,首先想到的是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公开图书馆经费”,几年过去了,除了起到了公开和透明的作用外,还有其他的收获吗?

葛剑雄: 有些人对这个做法不满意,但我做我的。我们去年的招待费又下降了,下降到1万多。我们没有公车,我是反对买公车的。上海公共服务很好,需要车,打电话租车就好了。有人说,复旦大学总的经费怎么不公开,那我说你问校长去吧,我怎么知道。

顾晓光: 现在二期的位置选好了吗?

葛剑雄: 学校校务委员会,包括校长、书记以及分

管的领导都达成共识,二期必须建在主校区里面,我们提了方案,但学校还没有批下来。

顾晓光: 19世纪末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说过: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您认同吗?

葛剑雄: 可以这样说。我对图书馆是乐观的,上次

开会有个美国人说图书馆没落,就要没有了。我认为图书馆作为一种工具,会逐渐被取代,但图书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是会一直存在的。今后的图书馆不纯粹是看书的,高校图书馆应该有各种讨论室、个人的研究室,还有可以提供各院系无法提供的新设备供大家体验,图书馆不仅是书库,信息的载体是多

样的,也包括提供学生共同活动的场所。

顾晓光: 那图书馆目前最大的竞争力是它的空间?

葛剑雄: 可以这样认为的。空间如果仅仅指很多座位的话,那么很多座位都要空下来了。比如现在图书馆的自修服务,是因为学校的整个条件不好,如果每个房子都有空调,读者何必非要到图书馆来呢。我们拿什么吸引读者呢?我有书,有讨论的环境,至少高校图书馆是能长久的。当然,我们也要适应变化,积极开发更多职能。

顾晓光: 您刚才说现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提供了最基础的服务,您认为高校图书馆为产学研需要提供哪些更深层次的服务?



理科馆外景

葛剑雄：这需要我们的图书馆员是国际意义上的图书馆员，在美国，能够被称为“馆员”必须是硕士以上，而且还是两门专业，除了图书馆学专业外，还有一门专业。我们下一步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做，至少要面对本科生多加服务，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顾晓光：图书馆的采访工作就像一本图书的编辑一样，是这个信息过载时代不容忽视的部分。高校图书馆如何在资源采访方面进行质量控制，好像您直接参与其中？在这方面院系的老师和图书馆员能在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听说复旦大学图书馆有一个图书馆咨询委员会？

葛剑雄：我这几年做的也是基本工作。第一，大规模地削减副本，现在基本上成功了。我们是研究型大学，除了医科、理科外略有放宽，文科我坚决只买一本，不做保存本，可以出借。有人说畅销书太少，满足不了要求，我说我们是研究型图书馆，不收藏畅销书。学生、教工难道就不能自己买畅销书吗，你又不是穷到这个程度。政治书也不例外，政治学习是你单位的事情。你十块钱的书找不到，你不要来找我们。一万元的书找不到，你来找我们，我尽量保证有，我们是这个路子。有的老师抱怨只有一本，别人看的时候自己就看不到

了。我就说难道你就不能买一本吗？我把少数民族语言的书籍砍掉了，因为复旦大学没有多少人研究。个别研究者尽量用自己的经费来买，如果有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有位老师研究纳西族的

文字，我们专门花了几万元为他买了一套相关的资源。

从馆藏上，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每年花二三十万收集江南清末民初的一部分特色资源，要有自己的特色收藏体系。家谱不收，因为家谱没有底的，而且上海图书馆已经有很多。我们也收藏方志、年鉴类的资源，特别是年鉴，我们收集的相当全。但是像拍卖的场合，我们不去，我们没有那么多钱，而且拍卖也没有什么好书。

我跟学生说，如果你需要什么书，可以推荐，如果确定购买的话，一个月到货。

我上任第二年成立了图书馆咨询委员会，任期两年，义务的，由各个院系推荐，分四个组，每年开一次会，我向他们报告图书馆的预算等情况。平时，重要的咨询还会找他们，也有院系的教授、副教授选书很精明，帮助我们选了很多好书。

我们每年砍掉大约3-5%的杂志，因为现在数据库的资源已经很多了。这样做有好处，我们的采购品种是全国高校第一，一般读者推荐的图书，我都尽量满足他们。

顾晓光：数据库的购买情况如何？

关于数据库，比如*Science*，他们的订阅费要涨

200%，而且根据下载量还要收钱。我就下令停掉。很多师生有意见，我说为什么不能停掉呢？我们有三本纸本，如果你需要，马上给你。的确，纸本的刊物要比网络版要晚半个月，那我就问复旦大学的水平与国际水平差半个月就来不及了？你实在需要，可以自己订，价格要便宜很多，你们有那么多经费，为什么不订？他们向校长抗议，我说复旦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差得很远，不订就是不订，后来上海交大也停订了，他们就没有话讲了。

我觉得我们对数据库要有自己的选择，我们想抵制高涨的联盟建立不起来，因为校长、院士出面，他们说非订不可，我说院士有什么了不得？他们说我们要建世界一流大学，那我说你来管图书馆吧。图书馆我说了算，我是不客气的。上次，还有个别数据库商鼓动教授来订，那位教授说自己是Elsevier的编委，我说我也是Elsevier的编委，你既然是编委，为什么不给读者说话？你有一本，你为什么不给系里的人看？给师生看是合法的，因为用于教学。我们顶住了，他们让步了，从两万英镑降到两千英镑，而且还可以把以前没有的补上。

我们图书馆要有一定的主意，而且学校也要给我们一定的支持。有些院系可以让个人去订，然后公开，也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我提过几次的，国家本来应该用于图书资料的钱，比如所有上报的项目都有图书资料费，都花到哪里去了？我跟教育部、财政部提过，今后国家大的项目拨款中，图书资料费应该拨到图书馆代管，专款专用，你不买书就要上交。现在漏洞不小了，好多单位500元以下的书可以不入账，那将1000元以下的书开成两本就规避了。有人还叫分管校长出面说情，我说你找财务，我这里500元以上的书，不拿书来，不编目，我绝不签字报销，谁讲都没有用。最近有个1500万的大项目，他们的工作人员说因为用书量大，来不及拿到图书馆去，我说我可以派人到你们那里做，这没有什么来不及的。

**顾晓光：**现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有3000多万资源费吗？

**葛剑雄：**不止，现在各项费用算上有4000多万了。去年电子数据库的订购经费是1300多万，已经超过纸本资源了。

**顾晓光：**前年，包括您在内的很多国内图书馆界的管理者发起了抗议国外数据库商逐年高比例上涨资源

费用的行动，并呼吁担任国际出版商学术期刊编委、审稿专家、顾问的我国专家学者，积极向国际出版商施加影响，要求他们正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经济现实，制订符合中国国情和保障可持续采购的价格政策。国外数据库商的这种行为在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请问最后的结果如何？

**葛剑雄：**毕竟是有效的，但是他们让的幅度没有台湾地区那么大。最后是涨幅控制在10-15%吧，我们也不反对涨，但不能这么涨。台湾地区在那一年的抵制后，涨幅在5-8%。

**顾晓光：**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将结果告诉我们，毕竟你们发布了公开信，还是要给公众一个结果。

**葛剑雄：**这可能涉及商业机密的问题。

**顾晓光：**学界有一个争论，高校图书馆的馆长是以图书馆学专业的学者担任还是以像您这样更有社会影响力的非图书馆学专业的学者担任。

**葛剑雄：**我觉得从实际出发。非专业的学者做馆长必须学习，不能连基本的业务都不懂。虽然很多具体的工作我不知道，但是大的方面我是明白的。无论是数字化技术、采编还是其他基本的东西，都唬不了我，也蒙不了我。

**顾晓光：**不是去当撒手馆长。

**葛剑雄：**对啊。你肯管才好。现在有学生要求，我们最多需要一天时间就要解决。我等会儿还要上微博，把读者的需求发给某个具体负责的同事，明天上班后，他就要分给各个部门处理，基本上当天就向我汇报，哪怕我在国外。

**顾晓光：**在图书馆学界，有一个争论：很多图书馆不愿意录用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和很多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不愿意到图书馆工作，这是图书馆的问题还是图书馆学教育的问题？请问你们这几年对新入职的应届学生录用时的考量是什么？

**葛剑雄：**我认为图情专业要拓宽，副修一门其他专

业,适应以后研究馆员的方向。比如一部分人要大大加强数字化,不是简单的编目,因为以后图书馆数字化的应用比例越来越高。另外,文献的部分要和其他专业结合起来,比如古籍整理。现在很多业务都外包了,书拿到后就可以上架了,我们很多业务不需要做了。所以图情专业要改革,不改革不行了。

另外,少量的人是做研究的,大量的人是做应用的。现在图情的学术水平就看论文,这些论文是做研究性质的,而真正应用的时候,光靠它是不行的。高校图书馆也应该注意到,图情专业的学生也是必要的。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就会出现,跟不上形势,有了新的潮流,比如编目的趋势,你怎么跟进啊?我们很多图书馆在经费上已经向发达国家图书馆接近了,那你还竞争什么呢?为什么我强调我们现在还是低层次服务,这只是满足到读者没有抱怨,但真正的图书馆是要起引领作用,那要靠什么?还是需要图情专业的员工。我觉得应该要有比较合适的比例。当然,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还是不同的。

另外,还有人文素养的问题。现在我们利用图书馆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把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事业,一个学生看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需要,而且是人生的需要,那就两样了。所以,大学里还需要恢复人文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的高尚不是仅靠几个人来看书,而是它本身对于人文素养的追求。

**顾晓光:**就像有学生问钱理群先生学鲁迅有什么用一样。

**葛剑雄:**是啊,你不学鲁迅是可以照样长身体,GDP也可以上去。如果这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方,你这个认识很正常。现在到了衣食无忧、略有结余的情况下,一个社会需要精神生活,需要精神生活是真正的幸福和真正的发展才会有的。在这其中,图书馆起到的作用并不仅仅是藏书这么简单了。

**顾晓光:**在学术界,一直有一个关于“学术和思想”的讨论,有人把它比喻成“刺猬和狐狸”。作为一位非图书馆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和一位图书馆馆长,您认为现在的图书馆学教育应该在“学术”上多做文章,还是在“思想”上多做提升?

**葛剑雄:**我想图书馆学也需要分流的,图书馆学浅

层次的是培养一种技能,高层次的是一门学问。这就像地理学一样,我说地理学应该是科学,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把它技术化了。科学是什么?要有思想。所以图书馆学作为科学来讲,它要研究未来图书馆发展的方向等问题,而不是满足今天数字化,明天RFID什么的,不是这样。有个尖锐的问题,下个世纪图书馆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图书馆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图书馆究竟提供什么样的功能,这些就需要思想,这就需要脱离图书馆宏观地来看。我不晓得在培养中间以及在发展过程中,现代的图情专业是不是还有这块儿。还有图书馆史,中国和国外的图书馆怎么发展过来的,你不知道过去,怎么去想象未来?这些就是提高的部分。提高的内容就是将来做成教材培养未来的人才,还有这个学科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它。

**顾晓光:**您刚才说以前也不经常利用图书馆,在《东方早报》的是否去书店和图书馆的调查中,您的回答是“近年几乎没有去书店买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书也来不及看。没有去其他图书馆借书。复旦大学图书馆与我自己的藏书已能满足我的需要,偶然通过馆际文献传递找过一两种资料”。从众多学者的回答中,也看到一个趋势,他们对于传统的书店和图书馆的需求越来越低了,而大多数老百姓的信息素养并不高,他们同样也不去图书馆。去图书馆的人更多是在求学阶段的群体。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葛剑雄:**我在以前的报告中提过,读书有三个目的:一是求知,现在这块儿最热闹;二是研究;三是人生乐趣。作为研究来讲,研究者很多已经不来图书馆了。为什么呢?一是我们图书馆的收藏不能满足高端的需要,院系资料室收藏的文献更多,更适合他们的科研;二是我们的出版物。这几年,我很为难大部头书的购买。我向采编的同事说大部头的书没有30%以上新内容的更新就不要买。复旦大学出版社社庆的会议上,来了很多出版社的老总,我向这些老总呼吁,希望你们有一点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你们出版物的重复率太高了,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不要光追求你们的码洋,再说我就是有钱买也没有地方放啊。

一个国家如果真正文化教育发达的,它是应该有高中低端不同档次的出版物,这样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英国的教学很发达,你到英国的书店,可以找到任何适应你需求的课本,比如有专门针对老人学语言的课本。而我国的出版呢?拿图书馆学来说,你有没有编出最高



五楼古籍阅览室内景

知识是什么态度，把它作为吃饭的工具，我论文有得发，职称有得提，项目拿到了，不做就不做。他不以为耻的，学生也是这样，往往本科生比博士生重视互联网。很多人也不知道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有什么。

国外把图书馆当成大家的精神家园，对书有种敬畏和神圣的感觉。我们还有很多，像音乐什么的，不把它当作人文的素养来提高，这就难了。

端的图书馆学著作，比如20卷，然后中等级别的，还有小册子。

图书馆也很难满足做到这一点，大量的书是重复的。我去兰州，听说省里文化建设里的大头居然是要重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这印它做什么？文渊阁已经印过了，还有光盘了，我们的费用就是这样被浪费了。

顾晓光：大英百科都不出版纸质了。

葛剑雄：是啊，《四库全书》根本就不值得重印。

如果我放开买，理科没有书啊。理科不是翻译的就是教材，今天北大版，明天清华版的，我说你们再买它干什么呢。买一本足够了。

顾晓光：我看过一个报告，发现虽然互联网可以做到随时随地地访问，而且我国的网民数量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数字鸿沟和以前的信息鸿沟比较并没有相应地减少差距。

葛剑雄：这就是要讲到学习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有些教授到现在拒绝上网，他觉得日子过得好好的，很多人一做教授、一做院士就无所谓了。但是他觉得今天求知，就像旧时代不会写毛笔字是可耻的一样，他就会去学习了。这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传统。你对待

顾晓光：你们有没有向教授进行定点的学科馆员服务？

葛剑雄：很难。我们学校有这么多的方向。比如古籍整理，我们古籍部是国务院的古籍重点单位，但是现在连一个专用书库都没有。我们西文善本也有不少好东西。

顾晓光：您现在用微博，以前也用博客。信息过载、信息泛滥，可能是您一直不用手机的原因之一。您如何看待诸如微博等社交网站的碎片化信息？有人认为读网时代会让人失去思考，但还有人认为会让更多的人接受到不同的信息。

葛剑雄：现在不用博客了，因为微博传播速度快，我的微博现在有31万的关注者。不用手机是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必要，我已经可以通过邮件和微博处理事情，一天要查收好多次，一点的信息延迟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会有很多采访，我主动发布更为合适。微博的好处就是快，面广，缺点就是只有140个字，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有人问为什么我只关注一个人（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官方微博），我这么多朋友关注谁好，如果都关注了，我就不要干事了。所以，我能回答问题就回答，过分的就不行了。

顾晓光：您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是否关注过这几年的图书馆界委员的提案？比如今年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先生提交了一项“关于建设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的提案”，内容有“应当尽快建设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对于国家重要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战略储存和异地备份，确保中华文化载体的长久安全保存。将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纳入新时期文化工作的重点领域，抓紧实施”。在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针的推动下，图书馆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

葛剑雄：图书馆要做一点实事。战略储备也要从实际出发，要有分工，国家要有这方面的准备。我觉得国家战略早点建，不要重复也不要漏掉，还有不要受到政治的干扰。再一个就是加强抢救性的资源，要收全，更重要的是利用。要查文革的史料，你要跑到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去，那你储备干什么啊？你在一定范围内要开放。所以，图书馆的发展也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的。

顾晓光：Google这个亦敌亦友的互联网大鳄，是与图书馆的数字信息服务差不多同时起步的，至少没有图书馆早。Google于2004年10月推出Google Print Publishers计划，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让-诺埃尔·让纳内此后发表了《当Google向欧洲挑战的时候：为奋起辩护》一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文版）。他主要站在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谈这个不怎么可爱的洪水猛兽。Google扫描了众多英语文献，势必会对欧洲很多非英语国家的文化传播造成影响。这些年过去了，您回头看，图书馆在文化保护和文化遗产上的步伐跟上这个互联网、全球化的时代了吗？



书橱排放内景

葛剑雄：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方言的“传”和“承”》（注：刊登在2012年4月15日的《文汇报》），“传”是最起码的，花精力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把现有的方言录下来，储存起来，而“承”要根据社会实际。你强制小孩子学方言不行，而且你要考虑方言有没有需求。举个例子，如果以后美国还是经济实力独大的话，它的英语霸权早就形成，你是改变不了的，法语想挑战英语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从“传”的方面，法语保留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图书馆，面对各种文本，只要把它传下来这是根本的，将来怎么发展不是图书馆界所能够左右的，也不是哪个国家所能左右的。

如果将来中国越来越开放、民主和强大的话，中文所占的比例会是大大提高。现在不管怎样，面对已有的中文，我们都有义务把它传下来，这是人类所共同的，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各做各的。至于将来，你是保卫法语也好，保卫中文也好，你保都保不住，不是你个人的意志。对“传”要一丝不苟，且多多益善；而对“承”，则只能听其自然。

顾晓光：很多国家把数字图书馆建设当成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问题来考虑，Google也在扫描其他国家的文献，也曾经有过扫描中国的图书馆馆藏的计划。

《数字图书馆论坛》网站有一个“您是否赞成Google在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数字图书馆计划？”的调查，前几天看，在近两千人的投票中，有超过78%的人持“赞成”意见，持“不赞成”意见的不到17%，持“不确定”意见的不到5%。由于我们的用户基本上集中在图书馆界，从这个调查结果看，图书馆的同仁绝大部分同意Google的国外数字图书馆计划。

葛剑雄：你只要保护好国家的权益，为什么不能合作呢？这不过是个技术手段。你自己不做，人家做你又不让，这就像我们改革开放后引进外国资本，有人说这是卖国一样的。中文的书相当一部分外国也是有的，比如哈佛大学的港台书就比复旦大学多，它做了又能怎么样？

我们正确的办法是欢迎他们做，但是要有条件。一是要有数字化范围，并不是所有书都给它；二是我要有我的权益，规定母本要在我这里，你可以有副本；三是需要有个等价的交换，比如你扫描了我1000万套书，那么英文的你也要提供我1000万套，或者双方要无条件将这些书都开放，关键是看你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书橱排放内景

顾晓光：现在抵制的群体有个观点：Google是一个商业公司，我们观念中的图书馆都是公益性的。

葛剑雄：它是商业，我也可以商业，政府不是禁止商业，是买服务。在商言商，卖给它，我们赚钱；买它的，保证条款。为什么不能商业，商业的东西比你自己做便宜啊。我一直赞成政府不要干涉太多，文化产业就要交给商人去做，这样才能买到最好的服务。

顾晓光：但是商业公司有可能会破产，或者作恶，那我们该怎么办？

葛剑雄：那你法律做什么？买军火就可以随便杀人啊。你要想想Google能够从中做什么，它买你一本书和扫描你一本书有什么两样？又不是我将网络都交给它。它可能作恶，就是它破产了，我们有预警机制就可以了。

再退一步讲，你不交给Google做可以，你自己做。现在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但是有一点需要说一下，中文图书有它的特殊性。扫描后，拼音文字可以轻易地被识别，中文的难度较大。各种版本差异很大，《四库全书》电子版里，“史”字就有两个没有收录进去，检索不出来，因为扫描后识别错误了。你说你识别正确率99%，我说即使你99.9%，如果让我碰到了错误的，就是100%的错误。何况这样识别的人才越来越少了，像一些懂书法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我在古巴的IFLA分会上也谈到这个问题，中文的识别比我们想象的困难。比如说同样两个字，意思不同的，需要专家来辨认。如何将中文很规范地数字化，不是很容易的。

顾晓光：国家应该在这方面上加大投入。

葛剑雄：对啊，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扶持，另外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很多古书，包括旧的平装书，如果没有相应的学者介入的话，光是IT人才是不行的。

顾晓光：这些文献没有版权问题，又是我们抢救文化遗产的基础工作。您如何看待我国图书馆界在数字图书馆建设方面的工作？目前世界范围内有几个大的数字图书馆项目，比如UNESCO的世界数字图书馆（World Digital Library）、美国的公共数字图书馆（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欧洲的数字图书馆项目Europeana，我国高校系统有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 CADAL），复旦大学图书馆也是CADAL成员之一，您如何看待目前CADAL的发展？

葛剑雄：很坦率地说，名不副实的。什么中美百万册书，最后美国人投了多少？第一期是我们投的多，他们投的少。第二期有件事情我坚决反对。美方扫描50万册书，这算他们的任务，我说原书必须拿来，否则版权上我们将无法流通这些资源。在我的坚持下，后来都运来了。不是这样，我拿他们的数字化干什么？没有专门的授权，我既不能出借，也不能用，因为原书不在我手里。还有，没有经过选择的50万册书有什么用呢？我看随意性很大。这个国家的钱花得荒唐。第二期的时候，我就问这是科研项目还是公共服务项目，后来教育部同意、发改委批准，这是公共服务项目。



书库

顾晓光：现在又多吸纳了几个国家，有变化吗？

葛剑雄：当时我就反对不能再用“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现在他们变成了“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再就是我说很多钱应该花在资料上，第一期资源费还没有技术费用高，这次稍微好一点了。教育部成立管理委员会，把我拉进去。那次他们签约的时候，我在那里大发脾气，我说今天我是来不来签约的。他们就求我，说签吧。我说即使签，这是意向性的，详细条款今后再议。你们必须把这句话写上，所以，签约前，有人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看，看有这句话我再签。

我说你现在有多少用户，用户得到什么了？第二期稍微好一点。由此我想到项目，现在国家很多机构都在做，甚至县一级都要在搞自己的数字图书馆，都在折腾钱啊。国家把这些钱集中起来，中国所有文献早就数字化了。

顾晓光：近代图书馆每一次大的发展都是通过技术的革新进行的，但技术的进步又离不开人文思想的指导。技术与人文虽不能厚此薄彼，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理解。比如有极端一些的“反技术化”，也有“唯技术论”。

葛剑雄：应该尽可能应用新的高性能技术，应用技术的目的最后是有益于服务。我是反对盲目地使用机器。使用机器的好处一是精确，二是高效。但人员富余的情况下，我为什么非要用机器呢？如果技术非高精的，只是为了节约人力成本，而我们的人力成本不高的情况下，为什么必须要用呢。而且学校里的学生还想参与，我觉得完全他们也可以做。“唯技术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对的。如果我把读书作为一种工具，当然越快越好，如果把读书作为人生的享受，拿本线装书，慢慢地欣赏，我要那么快干什么。就像我们听古典音乐一样，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将来图书馆会有不同的区域，为不同目的的群体服务。有人讲过，人文的学科需要空一下，才能够出成果和思想。

顾晓光：也就是需要有自己的和自己独处的空间和时间。

葛剑雄：对，或者是闲聊，不能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但是也不能排斥图书馆使用机器。技术确实很方

便读者，有人所不能及的，而且后台都有记录。但是有些就没有必要。

顾晓光：你们进行RFID这样技术应用了吗？

葛剑雄：我请我们馆员做了很长时间的RFID调研，考察了好几个馆。最后我们发现，除了设备以外，还有书的位置、芯片的位置都有很大的关系，看起来是技术应用，但与人的关系也很大。我们现在比较谨慎，从发展来看，它比磁条要好，是一个方向。另外一方面，技术发展很快，说不定新的很快就来了。所以，我们先试验好后再说。总的来说，它的功能是好的。

顾晓光：有的高校图书馆馆长明确表示不引进它。

葛剑雄：我们还是引进，现在从张江馆逐步推广开，并不急于全部都使用。

顾晓光：移动图书馆的应用情况呢？

葛剑雄：我们和书生公司签约了，我要求他们保证低端的手机都可以应用其服务。我们不是商务单位，很多学生还比较困难，我要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而且只要有一个学生不用手机，我不会把所有功能都转到手机上。在目前阶段，移动图书馆的功能有限，而且访问还需要流量费用。未来图书馆发展的趋势必定会是应用在每个人的移动终端上，不管是手机还是平板电脑。以后云存储后，我们和读者的联系就是通过移动终端。从这一方面讲，我们一定要做，积累一定经验，来迎接某个重大的突破。

我们不一定会追求最新的技术，比如刚才说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设备，我觉得太贵。将来如果真有条件了，我们应该是做一面墙，而不是这样一个机器。不能因为技术，我们越来越懒，越来越随意。我是主张除了特殊情况外，我们要有个正常的节奏，我不提倡半夜通宵在做事。

顾晓光：还有电子报纸阅读机，虽然价格并没有那么高，但它的使用范围也不大，毕竟一个馆也没有几台。

葛剑雄：《人民日报》给了我们三个，这更多是面向公众的一个宣传，我们学校并不需要这个。最近我们把《人民日报》纸本也减少到一份，我没有必要订很多，浪费。我建议大家从网上看，我们的报刊库里都已经有了。

顾晓光：最近看到台湾地区的“国立”台中图书馆新馆开放，被命名为“智慧图书馆”，进门后有一面大电子屏的“智慧墙”，上面是一个咨询网络。还有一个机器人，它可以还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图书馆有这样的机器人。

葛剑雄：这些可以作为展示，但全面推广就有一个经费的问题，还有适应性的问题。我用电脑是非常早的，我在复旦可能是第一批人。但是，大学里面的一些训练是用来提高技能的，不能单纯用数字化来代替。比如说一开始就电脑检索，那么字典都不会查了。我不担心书法，作为抄写功能肯定被淘汰，但作为艺术会有传承，现在有人会写显得更有价值。大学里，有些技能属于基本训练，不能用数字化替代。我就提倡看看没有标点的书，这样读者能够提高。如果一开始就从数据库来看，是不好的。

顾晓光：最近的发现系统是高校图书馆议论的一个热点。

葛剑雄：我觉得发现系统需要考虑前期的工作。简单的发现比较容易做到，拿我的书做例子，我统计了一下，我已经出版了54种书，但没有哪个图书馆都能够都查得全。有的书再版后用了不同的书名，这些需要人工来干预。同时，我发现了很多结果都有用吗？有的是重复的，有的是不同版本的。有些出版商为了挣钱，重版的时候换了名字。很多的质量控制都是需要我们馆员在前期进行，发现系统的困难在于前期的元数据上，这里面牵扯到知识产权、劳动报酬等一系列问题。

刚才我讲到文字识别，这些工作最高端的是人，没有人人为的干预，可能会一直错下去。很多著名的学者做的结论可能就是这些错误的数据库。我曾经举过例子：很多人说过，东晋时期，江西开始引种小麦。这被我发现是错误的，原文是“江之西”，“江”是指“钱塘江”。当时首都在建康，所以北方人要吃麦，就种到了浙江湖州这一带。如果不看原文，因为漏掉一个字，纯粹靠机器，这种错误会一直下去。所以，真正做研究的人还要手工做不少工作。我们图书馆也要把基础的工作做好。

顾晓光：所以，数字化的前期工作非常重要。现在很多数字化产品是全息化的，我们看到的是扫描影印版，但支持搜索的后台数据是识别过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库资源推荐给图书馆，您觉得钱够用吗？



葛剑雄：那没有底的。今年又逼着学校加了15%。所以我公布经费，从另一方面讲，就给学校很大压力。我公开说，如果发现哪本书买错了，我负全部责任。但如果说书不够，找校长去。

顾晓光：今年4月9日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发布了2012年美国图书馆报告，里面提到了三个困境。一是由于电子书的特点，很多出版商不愿意卖给图书馆用于读者借阅或者通过一些措施限制图书馆的电子书服务；二是美国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图书馆经费削减；三是纸本书借阅量下降。您认为我们目前面临哪些主要的挑战？

葛剑雄：现在有个趋势，电子书和硬件一起卖，这就像刘俊文做的古籍库一样，连硬件一起卖，还有超星也是这样，做个Pad，里面有很多资源，没法下载，只能阅读。

商人谋利是正常的，关键是政府需要做出自己的工作，既保证它有利可图，也要确保公众的利益。一是要有在数字化建设中反垄断的政策；二是政府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打破商家设置的壁垒；三是政府要有科研成果展示的引导。我们为什么要将文章发表在外国期刊，接受人家要求放弃版权的条款？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发表在我们中国的刊物上？而且，发表在外国期刊上，我们还要高价再购买。所以，我觉得光靠图书馆界是不行的，政府要起作用。图书馆界斗不过商人的。

还有就是政府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腐败让他们硬不起来。我就讲我这个馆长在复旦为什么可以这样，我的一切经得起考验。所以，我可以到学校拍桌子要钱，我说你可以查账，要来的钱，自己拿过一分没有？

顾晓光：我跟别人说过，您现在所做的，不仅是因为不拿钱，而且是现在学术上有了江湖地位，不用患得患失了。

葛剑雄：对啊。尽管我之前没有做过图书馆的数字化，但我做数字化地图已经十年了，我以前和图书馆的同行都是这样认识的。所以，你们唬不了我。图书馆馆长必须要这样，才能管得好。

我们现在很多图书馆的管理者有问题。有位馆长说还有几年退休，从人事处轮岗到图书馆，那怎么能管

得好。为了对付上面检查，有些馆长就和无良书商勾结起来，弄几十万册毫无用处的书。有人对我公开经费有意见，说我坏了他们规矩，而且还要求我公开我的出差费。我说我参加图书馆的会还经常用我的科研费，基本不花图书馆的钱。我说如果公开的话，我连收入都可以公开，因为对别人压力太大，我就不敢了。

所以，现在最大的忧虑，不是技术，而是我们图书馆的馆长。有些馆长怎么有资格做馆长？

反过来，有些学生来，说你是老师。我就说平时我是你老师，但现在你是我的服务对象。所以，你们有什么图书馆的问题，我都给你们解决。由于处在不同的位置，我可以和校长争取一些权利，但不好和学生说什么。学生过分的，我要制止，但基本的需求，我要满足他。

顾晓光：最后请您谈一下数字阅读吧。数字阅读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方便、普及。但另一方面，我们好像越来越不读纸本书了，很多学者认为这样会让人没有一个思考的空间，建议还要多读纸本书。

葛剑雄：我觉得读书是广义的，为什么非要读纸本书，网上阅读也可以啊。现在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比如电视，还有国外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听书。中国也有了，有人把我的文章也买去了，说要做Audio Book。就是看流行小说、网络小说，也没有什么不好。空下来，有些老的文人玩麻将，这就好吗？我对看书的观点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顾晓光：读书无禁区。

葛剑雄：我也不认为看书就是为了获得信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翻翻旧书、古书，作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不用去担心读书的人绝种，无非是读书的人多一点、少一点。至于它的盛衰都是很正常的。

当时，把毛笔改为钢笔、圆珠笔，有人说中国书法完了。现在中国书法还是有的，而且作为艺术，它还是吸引人的。就像京剧，你人为地延长它，延长不了的，但是有兴趣的人照样会有的。

顾晓光：是的，就像简体和繁体的争论一样。

葛剑雄：对啊，文化的断裂不是简体和繁体问题，文化的断裂是人，文化大革命把人都摧残了。只要人

在，文化还是能够得以延续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亡山林，有的连儒家经典也没有能保存下来，只能靠口头传播。济南人伏生原来是秦朝的博士，秦始皇禁书时，他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等伏生在战乱后回家，发现遗失了几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好在伏生还能背诵记忆，传授给学生。汉文帝时，伏生已年过九十，行动不便，朝廷只能派晁错到伏生家学习继承。伏生讲一口齐地方言，又口齿不清，只能让女儿传达，但晁错说的是颍川方言，还有二三成的意思不明白，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记录。要没有伏生，或者没有晁错的记录和传播，《尚书》的传承就会出现断裂。

人情趋简，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中国的文字从篆书变化到隶书、楷书，就是一个不

断简化的过程，从个别字、少数字的简化，到一批部首或文字有规律性的简化，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字体，然后又不断简化。从古代留下的金石和印刷文字中都可以找到由当时文字简化形成的“俗字”，书写文字中就更多了。就是在将简体字等同于“共党”时代的台湾，不少人已将“臺灣”写成“台湾”了。从文字工作者来说，要懂这些专业的东西，一般人完全不需要懂。你看英文里也有很多简化，UNESCO、IFLA，也是人情趋简啊。

顾晓光：和您聊天非常愉快，谢谢。

葛剑雄：谢谢。

(访谈日期：2012-06-19)



内景

## 复旦大学图书馆简介

复旦大学图书馆前身为戊午阅览室，由戊午级（1918年）学生集资购置图书建立，1922年正式建馆。1937年抗战爆发后，图书馆藏书一部分寄存于徐家汇复旦中学，一部分随学校迁至重庆北碚。抗战胜利后，沪渝两部师生在江湾开学，两地图书合并，总数未逾4万册。1947年以后图书馆工作有所恢复，但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藏书仅10万册左右。

建国初期，图书馆发展较快，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图书馆接收了14所院校的有关书刊，使馆藏量骤增至20万册。到1965年底，藏书量为120多万册。“文革”期间，图书馆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1978年以来，图书馆随学校教育事业的繁荣得到发展。截至2010年底，馆藏文献约500万册，其中线装古籍约40万册（包括善本6万册），民国时期图书10万册。订购中西文纸质期刊7000余种，可使用的电子图书163.9万种，中西文全文电子期刊3.38万余种（中文1万种，英文2.38万种），各类数据库256种。

图书馆现由文科馆、理科馆、医科馆、张江馆、江湾馆（李兆基图书馆）、古籍部（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组成。馆舍总面积57,984平方米，阅览座位约3,000个，周开馆时间105小时，日均接待读者6,000多人次。建于1958年的理科馆位于邯郸校区中央草坪西侧的望道路上，红砖墙建筑风格与中央草坪东侧的教学楼一致，是学校重要人文景观之一，理科馆馆舍面积为6440平方米，阅览座位约为600个。1985年建

成的文科馆位于邯郸校区南侧，馆舍面积为12,095平方米，阅览座位约为700个。

2000年，复旦大学与原上海医科大学合并，原上海医科大学图书馆改称为复旦大学医科馆，馆舍面积为9513平方米，阅览座位为700个。该馆是中国高等医药院校图书馆协会副主任委员馆，全国医学文献资源共享协作网华东地区中心馆，全国医学文献检索教学研究会理事长馆和秘书处，多所医科院校信息系毕业生的实习基地。

张江馆位于浦东的张江校区，2005年9月开馆，馆舍面积为8886平方米，阅览座位约为400个，现设有书库、图书借阅处、水岸休闲区、阅览室、专题学习室等。江湾馆（李兆基图书馆）位于学校江湾校区，2008年9月开馆，馆舍面积为19690平方米，阅览座位约为600个。设有阅览室、密集书库、网络学习区、协作学习区、培训室等。位于邯郸校区光华楼内的古籍部馆藏古籍包括善本及普通古籍两部分，向读者提供闭架阅览。

复旦大学图书馆是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馆，是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的两个全国中心馆之一。设有教育部面向全国和华东地区的外国教材中心，教育部文科外文图书引进中心书库、欧盟图书专架、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综合类）、上海市科委科技查新站（计算机与生物）、图书馆学硕士培养点、中国索引学会秘书处，承担《中国索引》和《上海高校图书情

### 馆长简介

葛剑雄，男，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高中毕业后当过十多年中学教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1983年在职获历史学博士。1981年至今任职于复旦大学，1991年晋升教授，1996年任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2007年任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图工委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事。

报工作研究》两种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图书馆除提供常规的书刊借阅服务外，还提供各类电子资源检索、Dialog国际联机检索、通借通还、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咨询解答、科技查新、查收查引、读者培训、自助复印等服务，并为各类读者开设文献信息检索课程，培养图书馆学硕士生。

近年来，图书馆本着服务第一、读者至上的理念，继续加强馆藏建设，不断扩展和深化服务，深入院系开展学科服务。同时，引进新技术，更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理念，努力发挥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和创新服务的功能作用。